

国家文物局主编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国家文物局主编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联合出版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书画卷》

国家文物局主编

出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陝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鲗鱼涌芬尼街 2 号 D 侨英大厦

制版：昌明制作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30 号新都城大厦

C 座 536 室

印刷：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头内环路南光路口 邮政编码 518051

发行：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开本：1180×1060 1/16

印张：32 插页：4

版次：199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1999 年 4 月第 4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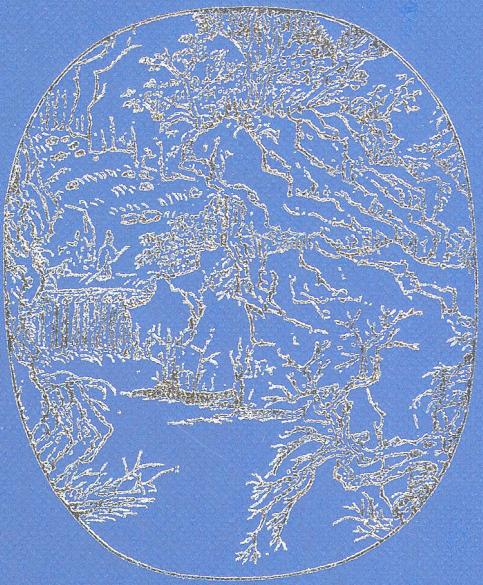
印数：8001—9500

书号：ISBN7-5326-0377-6/J·13

定价：458 元

(发行于中国大陆)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主编单位：国家文物局

主编：彭卿云

副主编：刘炜

编辑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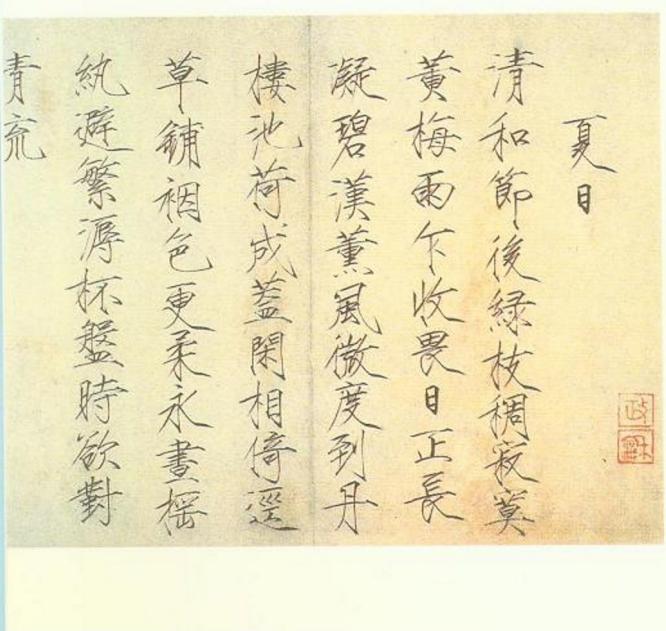
马承源	王芝芬	王志敏
王克荣	王勤台	王翰章
尤翰青	甲央	叶佩兰
史树青	白云哲	吕济民
朱世力	庄敏	刘谷
刘炜	刘九庵	孙传贤
苏俊	杨子荣	杨恺
杨关林	李复华	吴正光
邱宣充	沙比提	沈竹
宋伯胤	宋良璧	初世宾
张春生	陈仲明	陈方
陈孟东	罗哲文	周忠
侯菊坤	姚立信	姚真
耿宝昌	殷德明	高和
郭文奎	梅福根	彭凡
彭卿云	谢辰生	谭维泗
熊传新		

责任编辑：杨关林 王芝芬 谈宗英
陈光裕 王圣良 陈杰

装帧设计：江宝灵 甄玉琼 沈怡菁
江小锋

封面题字：顾廷龙

青流



书画卷

分卷主编：刘九庵

分卷副主编：王志敏

主要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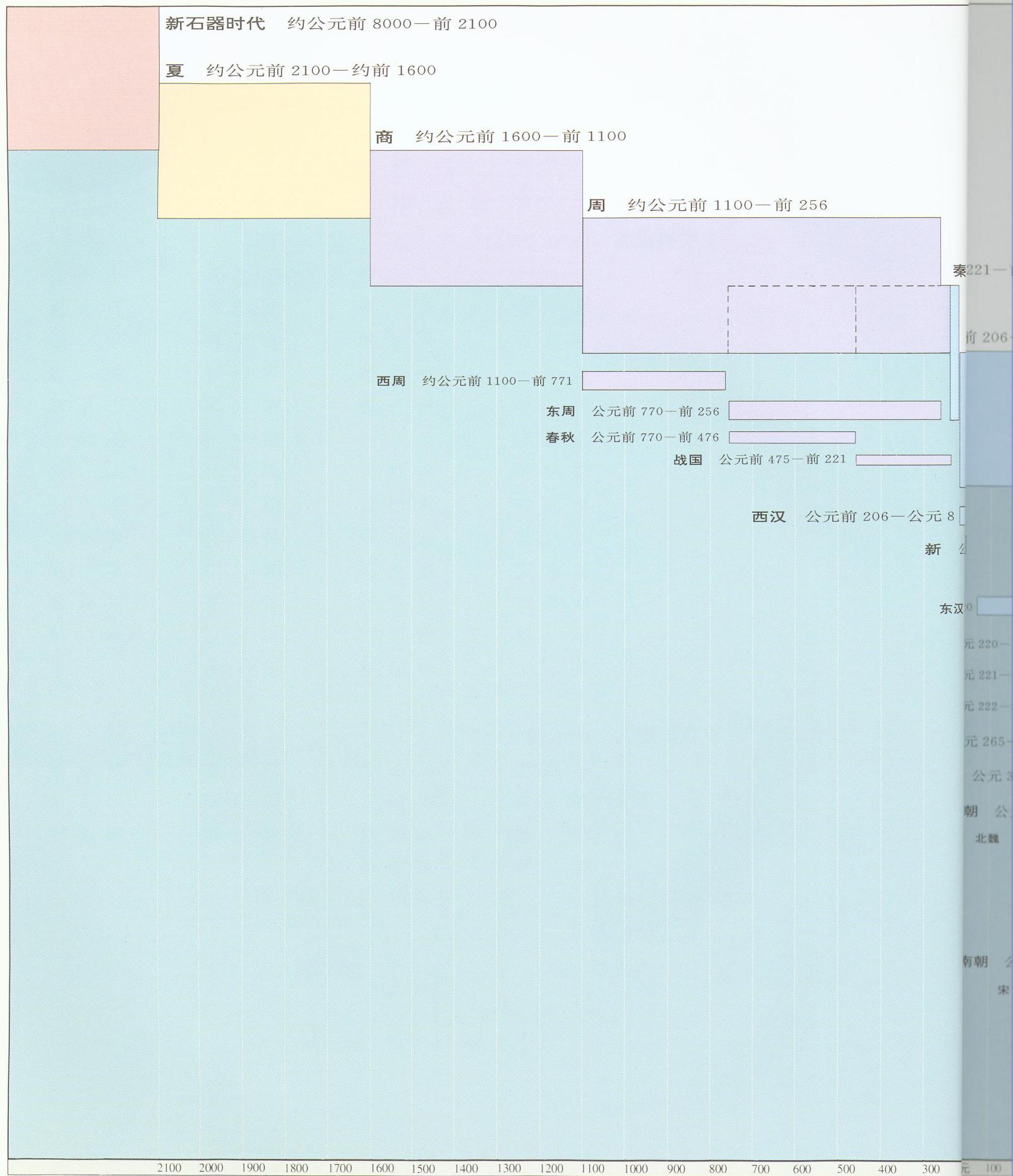
王启初	王南访	王梦凡	韦德昌
区 改	孔 晨	艾志高	石志廉
石雨春	朱旭初	朱恒蔚	华 宁
刘国展	孙秀清	劳继雄	杨 福
杨仁恺	杨丹霞	李红军	李艳霞
李遇春	汪 法	张孝宅	陈振东
陈梗桥	周克文	周其忠	郑 为
单国霖	承名世	赵 华	赵洪山
赵晓华	查永玲	钟银兰	施安昌
姚世英	秦化江	袁 杰	夏玉琛
徐英章	翁秀芳	黄 平	萧燕翼
梁 墉	董彦明	傅东光	傅红展
鲁 力	谢丽霓	潘深亮	

主要摄影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晓旋	王小宁	刘小放	刘秉君
孙之常	李振石	陈志安	郑 华
胡 锤	高丽双	郭 群	郭森福
梁 刚	董传远		



中国历史年代表



秦 元前 221—前 206

汉公元前 206—公元 220

三国 公元 220—280

晋 公元 265—420

南北朝 公元 420—589

隋 公元 581—618

唐 公元 618—907

五代 公元 907—960

宋 公元 960—1279

元 公元 1279—1368

明 公元 1368—1644

清 公元 1644—1911

汉 公元 205—220

魏 公元 220—265

蜀 公元 221—263

吴 公元 222—280

晋 公元 265—316

东晋 公元 317—420

北朝 公元 386—581

北魏 公元 386—534

东魏 公元 534—550

西魏 公元 535—557

北齐 公元 550—577

北周 公元 557—581

南朝 公元 420—589

宋 公元 420—479

齐 公元 479—502

梁 公元 502—557

陈 公元 557—589

北宋 公元 960—1127

南宋 公元 1127—1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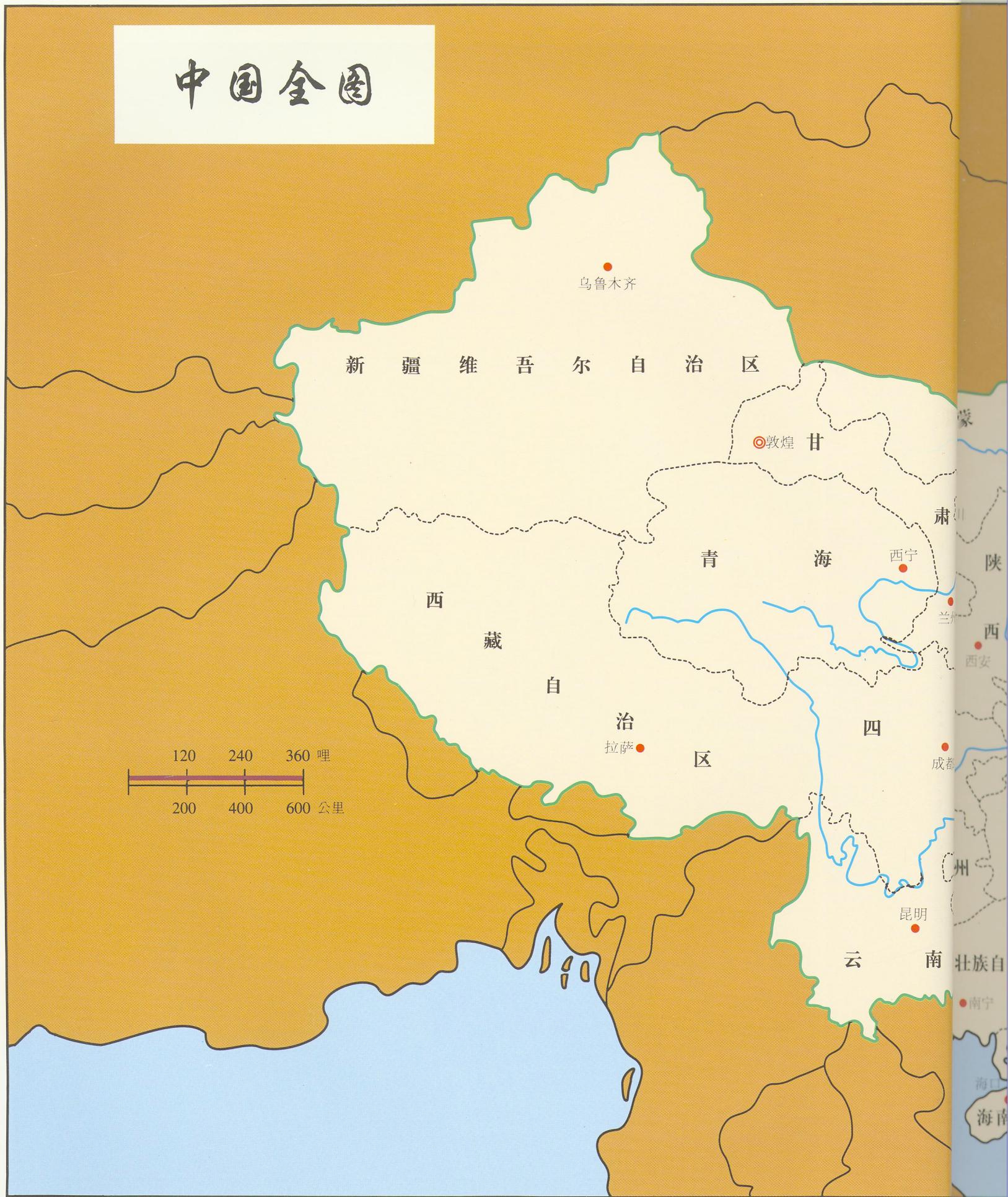
辽 公元 916—1125

西夏 公元 1038—1227

金 公元 1115—1234

2000 公元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中国全图





总序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是一部学术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工具书。它的编写工作,始于1982年冬天。那时,上海辞书出版社在同国家文物局合作编辑、出版《中国名胜词典》、《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的工作中,发现文物辞书的巨大潜力,又提出了编写馆藏文物辞典的构想。国家文物局出于对历史文化研究和弘扬的需要,同意作为文物系列辞书工程之一,承担编写任务。翌年即行组织、部署,付诸实行。此后,各项编审工作几经周折,历尽艰难,直至今天,才有幸同读者见面。十年磨一剑,一旦试锋芒,喜悦、欣慰之情,自不待言。

文物辞书的兴起,是文物普及、开放的一项创举,也是图书出版园地的一树新花。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第一部文物辞典的出现,曾一度风靡海内外,几成纸贵洛城之势。从此,各类文物辞书纷纷面世,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各界的读者,成为传播文物知识,弘扬历史文化的重要媒介。但是,更多的读者渴望能有一部更具规模和权威的馆藏文物辞典,发挥多种功能,满足各界的需求。在这种呼声的鼓舞下,《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编撰工作终于开始,大家都对此书的成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此书编辑工作,除了天时之顺,还享有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中国作为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保存在地面的文物史迹达数十万处之多,收藏在各地博物馆内的藏品共计千余万件,其中被视为国宝的一级品共十余万件。本书共收录文物五千余件,均选自一级品,近乎百里挑一,其基础之优厚,入选品之精湛,皆可想而知。特别是这五千余件文物,纵贯全部中国历史,横跨整个中国国土,各个朝代、各个省市、各个民族、各个品类,应有尽有。既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又考虑地区、时代、民族的平衡,使之环环相扣,形成有机的整体,充分体现中国文物博大精深,绵延不断,源远流长的特点,反映中国文明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史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中华古国辉煌历史的缩影。玉出蓝田,得天独厚。多姿多彩的中华文物,为此书提供了赖以立足生根的沃土良田。为此,编者、出版者十载耕耘,坚持不懈,决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内涵,把国内外读者引入古老的中华艺术之宫,让他们享受到永恒的美。

这样一部堪称鸿篇巨制之作,人和之利乃是成败的决定因素。国家文物局

作为主编单位,为此投入人力之众,财力之多,累计起来十分可观。全国各地参与组织、协调、撰稿、摄影、审议等各项基础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均数以百计,洋洋乎大哉。在编审过程中,研讨工作之反复,与各地编写人员交往磋商之频繁,更不可胜计。为编写图书如此兴师动众,在文物界确是十分罕见的了。大家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同心同德,共赴艰难,无私奉献。尤其是分别担任陶瓷、青铜、金银玉石、书画四大类分类主编的耿宝昌、马承源、史树青、刘九庵四位著名专家,从年富力强编到两鬓生霜,自始至终,尽心尽力,坚持承担把关、定稿、作序的任务,其事业心、责任感、治学精神,均可钦可佩。在他们分别所作的分卷序中,全面介绍了各卷的文物情况,并且从文物的产生、衍变,阐释了它的价值与意义;从人们对文物的探索、认识,概括了当代学术研究的成果;从文物的形态、特征,揭示了制作者的思维、创造的能力;从对器物艺术性的分析,激起读者对美的追求。此外,白云哲、叶佩兰、刘炜、周其忠、王志敏等专家分别承担各卷的主要编审任务,为之付出了大量心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这部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文物工具书,是包括许多无名氏在内的全体参与者共同努力、创造的成果,是许多专家、学者智慧和专长的结晶。它在各地发掘、收藏、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了专家、学者的主导作用,力求学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确保其权威性。

中国文物的丰富多彩,不单体现在数量之富,更重要的还是品类之全。历代先民生息、劳动所及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留下大量可供见证的实物。本书收入的五千余件精品,如按其用途分类,则百科具备,反映了古代人类生活的全貌。出于编辑、实用的需要,全书只能按器物质地共分成四大类(卷)。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艺术鉴赏机会,顺应世界出版业的新潮,全书一律采用实物原拍照片,其中彩图达百分之六十以上,美中不足的是台湾藏品因至今未能取得适当照片,只好暂付阙如。香港商务印书馆为了保证质量,不惜心力,采取最新技术出版精装本,向世界各国发行。编辑辞书,虽是雕虫小技,但真正适合众人的好辞书,又谈何容易。特别是文物辞书,非有图文对照不可。对于文物的鉴赏和研究,通常只能按图索骥,才有所获。因此,为了取得所需的合格照片,许多工作人员奔波劳碌,付出了大量心血。由于编辑工作的旷日持久,各地不断出土新的文物精品,又给辞书的收词时限带来了新的问题,最后经专家讨论,决定以 1988 年为终限。但是,鉴于此后又有考古新发现,如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商代墓的铜器等,曾经引起世界性的轰动,所以仍然未能忍心割爱,



收录了其中若干精华之最,从而尽可能使本“大辞典”名实相副。

中国现有的馆藏文物,是中国文物宝库中最可宝贵的组成部分,它所蕴涵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在当今百废俱兴的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如何保护、利用好这笔财富,是当代每个中国人应该严肃对待的重大问题。这里必须防止把文物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的两种错误态度:一是全盘否定文物的价值,搞民族虚无主义,拒绝古为今用;一是国粹至上,封闭自守,夜郎自大,排斥洋为中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大量有益于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文化精华,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用,许多能够发挥科研、教育、借鉴、审美等多种作用的文物,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认识,研究和展示工作仍是一大薄弱环节。特别是文物图书出版对于文物保护、开放的重要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估计,以致迄今没有一套能够概括中国藏品概貌的大型图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增大。这一状况,与泱泱文物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也与改革开放的要求不相适应,早已为社会各界所关注。文物作为人类的文化遗存,既为本民族所共有,又为全人类所共享,其本身就具有开放的性质。任何珍贵的文物,只有通过保护、研究,向全社会开放,让公众领略其价值,才能有机会发挥其作用。如任其永久韫椟而藏,秘不示人,就如同废物,无任何价值、作用可言。文物又作为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载体,同现代化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对现代化具有特殊的作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许多国家越是全面开放和发展经济,就越发重视文物的保护和开放工作。文物保护、开放的成绩,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标志之一。日本在开放过程中对国外的科技文化大量吸收,其现代化的速度遥遥领先于世界;与此同时,他们对本国历史文化遗产又倍加爱护,并且通过陈列、出版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开放展示,其成绩也位居世界前列。美国的开放和现代化被视为世界之最,它把五十年以上的有历史、纪念价值的建筑等都列为文物保护对象,而且千方百计地收藏世界各国的文物、艺术品。法、英、德等许多欧洲国家也莫不如此。它们的文物保护、开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予以加强,各自固有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也随之变得更加强烈、更加突出。为什么这些国家如此重视文物的保护、开放,而且能够融传统与现代化于一体呢?这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但是并不神秘,归根结底,是开放与现代化本身的需求。文物通过开放、展示,不仅满足人们对文物不断增长的爱好、兴趣,更重要的是赖以增强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维系民族团结,激发国人的献身精神。因此,研究和借鉴

发达国家文物保护、开放的经验,探讨传统与现代化的内在联系,正确处理两者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特殊关系,对进一步搞好中国文物的保护、开放,最大限度地强化全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令人鼓舞的是,正当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文物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各行各业都在抓住机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能高瞻远瞩,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改革开放的特殊需要出发,果断地确定了文物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总方针,并且拨出巨额专款落实抢救任务,把中国文物的保护、开放推向新阶段。此时此际,《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得以问世,确是风云际会,值得庆幸。如果它能够在中国文物的保护、开放工作中起到某种填补空白的作用,如果它能够在中国文物图书攀登世界高峰之路上迈进新的一步,这将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补偿。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里并没有自负、自夸的意思。但是,确也自信好的文物图书,能够较好地再现文物的内涵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同文物本身一样,能够跨越时空界限,跨越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给人以永恒的智、德、美的感染和启迪。这样的图书一定会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当然,它也同其他图书一样,优劣高下,不能光凭编者分说,而只能由读者评论,实践检验。《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由于规模巨大,内容繁博,差错疏漏必不可免。对此,竭诚欢迎专家、读者批评指正,以求“大辞典”更为完美。

彭卿云

1992年初秋于北京



序

中国古代书画是中华民族珍贵文物的构成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形成源远流长的伟大艺术传统,并与其他文物一样,同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物质证明与智慧的结晶。

在这漫长的艺术历史长河中,古代的书画家们曾创作了无可估计的优秀作品。早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先民们便用手中所能创造和改进的生产工具,创造了原始的艺术作品,那便是迄今发现的分布在大陆十二省区之广的中国岩画。岩画大多是凿刻的,也有少数是绘刻的,在真实、生动地再现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民族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如善于突出描绘物象的立体特征,形象轮廓不重视细节刻划与焦点透视关系等。其后的汉代画像石、壁画等,由其创作工具、手法以及立体艺术特征中,都可以找到中国岩画的艺术孑遗。也正是在这个时代里,绢帛与纸愈来愈成为书画创作的用材,材料与工具的更新、改进,极大地刺激了书画艺术的发展,既促使书画艺术在汉魏之际发生本质的转化,获得了艺术自觉的新生意义,同时奠定了中国古代书画以纸绢为主体的表现形式。从那时起,古代书画不再因凿刻在岩石上而得以保存下来,也不再因殉于墓穴中而被后人偶然发掘,而是被当作艺术品收藏、传代。

至今仍有相当丰富的古代书画作品被保留下来。这些历史遗存,其绝大多数当然不是自然的、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曾经受到人们精心保护的人为结果。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总结古代书画保护的主要经验时说:“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阅玩而不能装裱,装裱而殊无铨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这就是说,书画作品的收藏、保护,必须先行鉴定,鉴别真伪、优劣,在开卷欣赏、装裱书画时,还须有一大套正确的方法。这些行之有效经验、方法是古人在实践中逐渐总结出来的。例如南朝宋虞和的《论书表》曾记:“桓玄爱重书法,每宴集,辄出法书示宾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提书,大点污。后出法书,辄令客洗手,兼除寒具。”指出书画开卷欣赏所应注意的场地、场合,以及应加警戒事故发生。由此可见,虞和所提到的桓玄,乃东晋时酷爱书画的大收藏家。此人以其权势,巧取豪夺,欲使天下书画精品集于一人之手,并也曾善加

保护。这些书画精品后归刘宋王朝所有。《论书表》曾记当时内府收藏法书，仅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书，即有“缣素书珊瑚轴二帙二十四卷，纸书金轴二帙二十四卷，又纸书玳瑁轴五帙五十卷，皆金题玉躞织成带。又有书扇二帙二卷，又纸书飞白章草二帙十五卷，并旃檀轴。又纸书戏学一帙十二卷玳瑁轴，此皆书之冠冕也”。可见内府收藏之丰富和装潢之精美。在中国古代，每一王朝的内府历来都是收藏珍宝、艺术品之所，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古代的博物馆。此外，每代又皆有个人的收藏，成为历代知名的个人收藏家。自隋唐以后，收藏风气更盛，并开始出现了收藏品的专门记录。初唐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历来被看作是收藏著录之祖。其后，宋宣和内府的《宣和画谱》、《宣和书谱》，米芾的《画史》，明张丑的《清河书画舫》，以及清内府的《石渠宝笈》三编等书，皆是官、私书画收藏的重要书画著录书籍。我们从中可以了解许多古代书画作品的流传过程，以及有关艺术评价、收藏保护等情况。

凡有书画的收藏，必有书画装裱。书画作品的卷、轴、册、页的装裱形式，也成为保护书画作品的重要手段。据《历代名画记》载：“宋时范晔，始能装背。”而《论书表》中所记二王父子法书的装裱，饰以金、玉、玳瑁、珊瑚等名贵材料的装轴，大概在那时书画装裱的技艺与形式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此之前，“晋代装书，真草混杂，背纸皱起”，显然尚处于铨次混乱、装背不精的阶段。至隋唐时，书画装裱技艺更获发展。《历代名画记》中“论装背膘轴”一节文字，记载了晋以后各时期的书画装裱材料、技艺及优劣品评等，是有关装裱的早期专门记述，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也表明了隋唐以后所能达到的技艺水平。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的“裱背十三科”和明周嘉胄的《装潢志》等书，更是记录书画装裱全过程，以及取得新发展的专门文献记载。书画装裱的作用愈来愈受到收藏家、书画家们的重视，用重金延请优秀技人的例子屡见不鲜。对于书画的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沿用至今的传统技艺和书画装潢的传统形式。

尽管如此，在历史中消亡的书画作品仍然不计其数，天灾人祸的种种原因使人防不胜防，因此古人早已发明了制作副本的方法，来使法书名画传神、传世。传统的书画复制方法，主要有摹画、摹写和刻石传拓等。如晋顾恺之的名作《洛神赋图》，原迹早已不存，但至今却流传有三种副本，仍可以窥探原作的风神。晋王羲之的法书作品，可以说已没有一件真迹了，大多数墨迹本，皆是双勾摹拓本，也有少数临写本。最为人们重视的有号称唐贞观拓书人冯承素摹本

